

# 历史时期五岭交界地的处境

## ——以郴韶地区为中心的探讨

中山大学历史系 陈琼芝

**[摘要]:** 五岭作为珠江水系与湘江水系的分水岭,在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建置中并没成为直接的分界线,大量历史资料表明,行政区划在五岭地区实际处于交错状态。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五岭还经历了从文化上的华夷之界到楚粤分界的变化。如果按照传统的看法,五岭地区涉及到自然地理、行政区划、社会文化三条不同的界线。过去的研究基本上把五岭作为一条固定界线,来探讨自然区域、文化区域的内涵及其与行政区划的关系。本文则欲以五岭之一——骑田岭上的郴、韶两地为例,从三个方面:一是从华夷之界到楚粤分界的历史过程,二是五岭在行政区划中的非界,三是界的历史过程,对五岭交界地进行阐述,进而对界的历史建构过程作一初步论述。

**[关键词]:** 界 ; 五岭 ; 郴韶 ; 交界地

### 前 言

五岭,自东向西,横亘在南中国,五岭较早的记载见于《史记》:“(秦)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sup>1</sup>五岭之说,诸家不一。晋裴渊《广州记》云:“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斯五岭。”<sup>2</sup>刘宋邓德明《南康记》曰:“五岭者:台岭之峽,五岭之第一岭也,在大庾;骑田之峽,五岭之第二岭也,在桂阳;都庞之峽,五岭之第三岭也,在九真;萌渚之峽,五岭之第四岭也,在临贺;越城之峽,五岭之第五岭也,在始安。”<sup>3</sup>成书于北魏的地理名著《水经注》记录五岭的名称与邓说基本相同,《舆地志》云:“一曰台岭,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骑田。三曰都庞。四曰萌渚。五曰越岭”。唐初,为《汉书》作注的颜师古又认为“五岭是从衡山之南起始,向东延伸到海滨”的一系列山脉中的五个山名,稍后,为《后汉书》作注的李贤、著《通典》的杜佑亦持相同的观点<sup>4</sup>。可见南北朝以来,五岭都被认为是南方的高大山峰或山脉,不过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却一反常说,云:“五岭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sup>5</sup>虽如此,后人在叙述五岭时往往是指山峰之义,尤其是在地理志与方志中。今天我们所指的“五岭”皆是指构成南岭山脉的五座主干山岭,位于今天中国湖南省、江西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4省(区)边境。

<sup>1</sup> [汉]司马迁:《史记》卷89《张耳陈余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sup>2</sup> 《史记》卷89《张耳陈余列传》,引唐司马贞《索隐》。

<sup>3</sup> [明]杨慎:《丹铅总录》卷2《五岭考》,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梁佑刻明遮修本,中山大学图书馆藏,第8页。

<sup>4</sup>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六十四《吴佑传》,李贤注:“岭者,西自衡山之南,东穷于海,一山之限耳,别名则有五焉。……裴氏之说则为审矣。”中华书局,1965年;杜佑:《通典》卷184:“自北徂于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峽,时有五处,……西自衡山之南,东穷于海,一山之限也。”中华书局重印商务本,1985年。

<sup>5</sup>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地理门”,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以前的学者对于五岭的研究多集中讨论“五岭”之说有哪些，具体的五岭位置在哪里，如韦祖松 金强的《五岭界说及其文化象征意义》（《东南亚纵横》2005年1月），吴榕青的《裴说“揭阳”岭考辨——兼论“五岭”》（《韩山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但是五岭作为一道天然的地理屏障，且作为珠江水系与湘江水系的分水岭，这在水经注中就有说明，“漓水与湘水出一山而分源也。”其重要性在很多文献中都有体现。地理志有时会直接把五岭作为行政区划的界线<sup>1</sup>，不过大量历史资料表明，行政区划的建置中五岭并没有成为直接的分界线，行政区划在五岭地区实际处于交错状态。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五岭还经历了从文化上的华夷之界到楚粤分界的变化。如果按照传统的看法，五岭地区涉及到自然地理、行政区划、社会文化三条不同界线的一个交界地。作为交界地往往错综复杂，其中涉及的边界形成过程，可以使得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政区是怎么划分的，文化区域是怎么形成的，所以讨论边界的形成过程显得非常有意义。

对于“（边）界”的研究，周振鹤在《地方行政制度志》中对政区边界的由来作了分析，认为其作为行政区划的第二个因素，随着郡县制的萌芽，边界概念就逐渐产生了，到了战国时期，边界概念已经十分清晰，到秦汉一统帝国时代，在开发比较深入的地区，郡界、县界已经有明确的四至与走向。<sup>2</sup>唐晓峰的《人文疆界》（《读书》2001年第7期）对于人文疆界的行政边界之发展历程作了大致的回顾，由中国《说文》的“畛（界），境也，从田，介声”，作为农田的疆界，到王朝国家的边疆，再到西方近代国际关系中产生的边界概念，可见边界的涵义在发展变化，而今天研究中的边界不止是行政边界，有自然边界，还有社会文化边界。近年来，关于文化区域的研究多以省为单位，因为“以今天的省区作为研究范围便于历史文化区的变化过程，同时也有利于研究行政区、自然区与文化区之间关系”<sup>3</sup>。如张伟然的《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及《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从语言、信仰、聚落、习俗、宗教等方面着手，“探讨历史时期湖南地区文化的空间组合状况”<sup>4</sup>，欲“复原湖北历史时期的文化面貌”<sup>5</sup>，在《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一书中论述了自然区域与文化区域，行政区域与文化区域的关系，意在论证地理环境与行政建置对于文化发展的影响。后来张晓虹的《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地理文化研究》，也是以陕西省这一行政区划为对象，“廓清历史时期陕西地区文化景象的空间布局及其形成背景”，从自然地理出发到行政区划的变迁，再到重要的

---

<sup>1</sup> [元]脱脱：《宋史·地理志》中写道：“荆湖南、北路，盖《禹贡》荆州之域。当张、翼、轸之分。东界鄂渚，西接溪洞，南抵五岭，北连襄汉。”“广南东、西路，盖《禹贡》荆、扬二州之域，当牵牛、婺女之分。南滨大海，西控夷洞，北限五岭。”中华书局，1977年。

<sup>2</sup> 周振鹤：《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参见第七章，犬牙相入还是山川形便？——行政区域划界的原则，第226-230页。

<sup>3</sup> 周振鹤语，为张伟然的《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作序时所说，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sup>4</sup> 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导言第1页。

<sup>5</sup> 张伟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绪论第5页。

文化因子：学术文化、方言戏剧、佛教、风俗，最后总结三个方面的互相关系，探讨陕西文化区的形成。<sup>1</sup>按照文化区的不同分类很自然的用今天的行政边界来限定一个功能文化区，不过，我们今天的省界不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而两个文化之间的边界就更为复杂，正如 R·J 约翰斯顿所说“随着人口迁移的不断增强，社会文化边界已变得尤为复杂，那种简单的制图显示早已不再凑效”，“社会文化边界的动态变化通常是根据社会公众倾向的反应而变化。”<sup>2</sup> 所以西方的学者在探讨文化地理时，对于边界的研究是要“搞清楚人们是否总是通过创造一个有疆界的地域（常常是那种排他的地域），继而通过对这一领土的控制来定义自己（包括生理方面和心理方面）和保卫自己”<sup>3</sup>，然后论述边界的变化发展。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回归到历史中，看回时人的言论，本文主要通过古代士大夫及文人如何描述五岭交界地，来探讨边界的形成及演变过程。

选择郴韶地区，因为历史时期的郴韶两地处于五岭地区，地理位置之重要早在秦平岭南时便已凸显。秦军进攻岭南，兵分五路，其中一路即由“湖南长沙经郴州，越骑田岭至连州，入广东达番禺”<sup>4</sup>。略定岭南以后，秦王朝筑通粤道四条，其中之一“从湖南郴州，跨骑田岭，出阳山关（今广东阳山县西北），沿湟水（今连江）东南行，经湟溪关、涯口，取北江南下可抵番禺”<sup>5</sup>。到了清代，骑田岭道与秦汉时期路线已不一致，它由广州沿三水溯北江而上，经韶州，逆北江上游之武水抵乐昌，进入武水之泷水段，抵达坪石。从坪石再往湖南，有数条路可走，最重要的是从坪石神头岭进入郴宜古道，经宜章，跨越骑田岭，再入郴州。<sup>6</sup>具体而言，郴韶两地处在古骑田岭道上，作为古代交通的要道，附近的折岭关，向为湘、粤通道。关于这一地区的研究，很多都是从湘南和粤北这一角度切入，论述其历史沿革或者经济发展。<sup>7</sup>从交界地这一角度研究的有唐立宗的著作《在“盗区”与“政区”之间——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波动与地方行政演化》<sup>8</sup>，主要是对南赣毗邻地区的研究，重点叙述了南赣巡抚的状况，其间涉及郴韶地区，不过只是集中在明代。这些研究让我们看出这一地区作为交界地，经济、行政区划及自然地理、文化地理等要素在其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sup>1</sup> 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绪论。

<sup>2</sup> R·J 约翰斯顿：《人文地理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3页。

<sup>3</sup>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杨淑华，宋慧敏翻译，第141页。

<sup>4</sup> 胡守为：《岭南古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页。其中胡先生文中所云郴州为今地名。

<sup>5</sup> 张荣芳：《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6页。

<sup>6</sup> 参见黄国信的博士论文《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临地区食盐专卖研究》，导言，第16页。

<sup>7</sup> 如《清代粤北经济区域的现处于特定》（陈忠烈，《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粤北区域经济地理的历史变迁》（李海东，司徒尚纪，薛德升，《热带地理》2003年第4期）论述了粤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还有黄国信的博士论文《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临地区食盐专卖研究》，从湘粤交界地郴韶的地理环境出发，旨在理清“清王朝食盐专卖制度下的政治关系、市场关系和区域关系，探讨因缘于不同人群及其观念而产生的不同的区域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力图对区域、区域之界等分析概念提出新的理解。”

<sup>8</sup> 唐立宗：在《“盗区”与“政区”之间——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演化》，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2002年。

---

骑田岭又名黄岑岭<sup>1</sup>，明清时期很多诗词在描绘黄岑岭、折岭（黄岑岭东麓）的时候，往往是说其“楚边”“南界粤”之地。但是再翻阅文献会发现，骑田岭不是当时的郴州与韶州政区上的分界线，在《大清一统志》中对于黄岑岭、折岭的位置很清楚的表明“在州南六十里接宜章县界”，折岭“在宜章县北三十五里即黄岑岭东麓”。<sup>2</sup>如此，这里便要求我们进一步去探讨：五岭作为自然地理很重要的一系列山脉，其作为界是在什么意义上？这一交界地在政区的划分上是怎么样的？而处于五岭两边的郴州韶州在古人心目中的文化归属又是怎么样的？本文在查阅了相关正史与文集，重点阅读了郴韶地区的地方志，又参考了从唐至明清时期文人士大夫的诗文，欲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初步解决这些问题：一是五岭从华夷之界到楚粤分界的历史过程，二是五岭在行政区划中的非界，三是界的历史过程，对五岭交界地进行阐述，进而对界的历史建构过程作一初步论述。

### 一、从华夷之界到楚粤分界的历史过程

华夷地域的论述可追溯很远，唐朝贾耽《古今县道四夷述》所载“中国本之《禹贡》，外夷本班固《汉书》”（《新唐书》本传），意思是《禹贡》是讲“中国”地理的首篇，而记述“外夷”的地理书则要推《汉书》为先。其实，《禹贡》虽然没有对外夷作具体叙述，但对之进行了明确的定位，提出了人文地理上“华夷之限”的思想。这也是中国古代极为重要的地理观念。《禹贡》五服的概念表明，以京师为天下文明的核心，离开京师越远，文明程度越低，五服中最远的两服即要服与荒服“乃在九州外矣”，就是说“要服”、“荒服”属夷不属夏。所以后人在叙述其地理沿革时想方设法置其疆域于九州之中。那么《禹贡》中的华夷南界在哪呢？九州中位于南方的主要是荆州，“荆及衡阳惟荆州”，由此学者们对于荆州的范围作了很多研究，关于衡阳的说法有很多种，有学者认为其在秦岭中，并不是今天的衡山以南，当然即使是今天的衡山以南，可看出当时的华夷之南界没有延伸到五岭。到春秋时期，按照史念海先生对于蛮夷的讨论，“春秋之世，百蛮多属于楚”，而楚“南则不越洞庭湖”，<sup>3</sup>可知当时五岭还不在界定“华夏”所需考虑的范围之内。

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华夷之界是在不断变化的，正所谓：

谨华夷之辨，亦变文也，楚至东周强于四夷，僭王猾夏，故伯者之兴，以攘却为功，然则自晋伯中衰，楚益侵陵中国，俄而入陈围郑平宋，盟于蜀，盟于宋，会于申，甚至伐吴灭陈蔡，假讨贼之义，号于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书楚事，无不一致其严者，而书吴越与徐，亦必与中国

---

<sup>1</sup> 《水经注》中就有说“黄水注之水出（郴）县西黄岑山，山则骑田之峽，五岭之第二岭也”。酈道元：《水经注》卷39，巴蜀书社出版，王先谦校本，1985年。

<sup>2</sup> 《清一统志》卷288，[清]和珅等纂，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0册，第623页，第625页。

<sup>3</sup>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2页。

异辞。<sup>1</sup>

秦“南有五岭之戍”，至“高帝已定天下”的“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sup>2</sup>五岭处于长沙国与南越国的交界位置，成为中国与百越的交接地，如《汉书·天文志》所述：“占曰：南戍为越门，北戍为胡门”。之后这一界线更加清晰，晋酈道元称：“古人云五岭者，天地以隔内外，况绵途于海表，顾九岭而弥邈，非复行路之径，信幽荒之冥域者矣。”<sup>3</sup>

汉唐以来很多文献中都有相关表述。到了唐代，岭在时人的表达中往往成为华夷界线的一部分。唐人狄仁杰曾上疏以为：“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东距沧海，西阻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遐荒而隔中外也。”<sup>4</sup>《新唐书·天文志》引述了唐僧一行的“两戒”说，曰：“自上洛南逾江、汉，携武当、荆山，至于衡阳，乃东循岭徼，达东瓯、闽中，是谓南纪，所以限蛮夷。故《星传》谓北戒为‘胡门’，南戒为‘越门’。”<sup>5</sup>这里的岭应该指的是五岭，是作为限蛮夷的一条界线。且僧一行的两戒说影响深远，后人在天文分野中多有引用，可以看出“在唐人的感觉中，岭的存在实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空间事实”，<sup>6</sup>在唐人心目中，言中华文化，岭南是不与的，张说有句云：“岭路分中夏”<sup>7</sup>；宋之问亦云：“崛起华夷界，信为造化力”<sup>8</sup>；以至当时度岭的人往往产生一种“去国”的情绪。宋之问称：“度岭方辞国”<sup>9</sup>。李绅的“天将南北分寒燠，北被羔裘南卉服，寒气凝为戎虏骄，炎蒸结作虫虺毒，周王止化惟荆蛮，汉武凿远通孱颜，南标铜柱限荒徼，五岭从兹穷险鉴，衡山截断炎方北，回雁降南瘴烟黑，万壑奔伤溢作泷……岭上泉分南北流，行人照水愁肠骨。”<sup>10</sup>表明宋以前五岭不仅仅是一道界定岭南岭北的天然屏障，也不仅仅是扼守两广至江西、湖南的关隘孔道，而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成为华夷分隔、内外有别的分界线，将地理概念上的岭南与岭北抽象为文化意义上的“化内”与“化外”、“文明”与“蛮荒”。

上述对于五岭作为华夷分界表述的淋漓尽致。那么作为“控扼五岭”的郴州韶州是否因五岭一界而成为华夷分界地呢？

<sup>1</sup> [清]皮锡瑞：《经学通论》四《春秋》，《论赵汭说春秋策书笔削近是孔广森深取其书而亦不免有误》，中华书局1988年。

<sup>2</sup> [东汉]班固：《汉书》卷95，《南粤传》，中华书局，1962年。

<sup>3</sup> 《水经注校》卷36，王国维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34页。

<sup>4</sup>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89，《列传第三九·狄仁杰传》，中华书局，1975年。

<sup>5</sup>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31，中华书局，1975年。

<sup>6</sup> 张伟然的《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及地理意象》，载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及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314页。

<sup>7</sup> 《全唐诗》卷88《喜度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0页。

<sup>8</sup> 《全唐诗》卷51《早发大庾岭》，第155页。

<sup>9</sup> 《全唐诗》卷52《度大庾岭》，第159页。

<sup>10</sup> 《逾岭岿止荒陬抵高要》，载于嘉庆《郴州总志》卷37，《艺文下·七言古》，[清]朱僮修，陈昭谋纂，中国地方志集成。

---

郴州在时人言中是“郴土群山高，耆老如中州”<sup>1</sup>。韩愈认为：“郴之为州，在岭之上，测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气，于是焉穷。气之所穷，盛而不过，必蜿蜒扶輿磅礴而郁积。衡山之神既灵，而郴之为州又当中州清淑之气，蜿蜒扶輿磅礴而郁积其水土之所生，神气之所感。”<sup>2</sup>可见处于岭之上的郴州当时沐浴着“清淑之气”，但是气已穷已矣，所以王维在《送杨少府贬郴州》时说道：“愁看北渚三湘远，恶说南风五两轻。”<sup>3</sup>

对于韶州，在张伟然文中说道：“在中原文化的观照下，当时岭南内部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其差异性。只有两块地方显得较为特别。其一是桂、柳二州，其二是连、韶二州，在唐人眼中，此地在文化上较为接近中原。”<sup>4</sup>韶州控扼岭南东部交通要道。皇甫湜《朝阳楼记》称：“岭南属州以百数，韶州为大。其地高，其气清，南北之所同，贡朝之所途。”<sup>5</sup>可见，具体到郴韶，表述会有变化，没有很突出华夷这一界线，但是依然可看出这里与中原文化的边界。

经历隋唐的发展，由于中原人士大量南迁过岭定居、岭南经济文化发展及其与中原联系日益密切。杨万里（1127~1206）曾在广南西路仕宦多年，亲身感受了五岭以南吸收中原文化的历程，他在《郁林州教授毛嵩老墓志铭》写道：“郁林，瘴疠地，士不知学。嵩老曰：‘人谓教官无职事，育人材，非职事耶？’日入黉宫为诸生讲古今圣经贤传，口授指画，士得所宗，始竞于学，中州文风，五岭不隔。”宋人乐史（903~1007）还引经据典证明南越在中国由来已久，他说：“昔在虞舜，南巡至于苍梧，今桂州也。《禹贡》：淮海维扬州，传曰：北距河，南至海。然则南至海尚为九州焉。其后，德有衰隆，化自远迹，盖自五岭以外，浸为夷俗。流兜于崇山，今州去长安万一千三百里；周为越裳之国；秦初得天下，谪卒戍五岭而守之，其后逾岭攻取陆梁之地，命任嚣尉之，今南越是也，其为中国也久。”<sup>6</sup>但是两宋时期对于五岭作为华夷之界，内外之分的表述并没有完全改变，宋杨冠卿（据《四库总部提要》所说杨生于绍兴年间）在《代贺广东经略程直阁启》中说道：“惟祝融之奥区，奠天子之南服，内制五岭，外控诸蛮。蜒俗群居，虽乐衣冠之化，鲸波万里，迭兴蛇豕之妖。故得人则尽治一边，而选帅则常重他镇。”<sup>7</sup>宋毛晃亦称：“荆扬虽地接百越，然界以五岭”<sup>8</sup>而郑樵（1104~1162）则不同意五岭以南在禹贡时属于九州之域，明言：“雍州西境，流沙之西，荆州南境，五岭之南，所置郡县，并非九州封域之内也。”<sup>9</sup>其实五岭以南在秦以前并没有在中原统治版

---

<sup>1</sup> [唐]王昌龄：《出榔口至叠石湾野人室中寄张十一》，《全唐诗》卷140，第326页。

<sup>2</sup> 《全唐文》卷555《送廖道士序》，中华书局影印，1983年，第5619页。

<sup>3</sup> 《全唐诗》卷128，第298页。

<sup>4</sup> 张伟然：《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及地理意象》。

<sup>5</sup> 《全唐文》卷686，第7026页。

<sup>6</sup>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76，《南蛮一》，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年，第4页。

<sup>7</sup> [宋]杨冠卿：《客亭类稿》卷5，天津阁影印本，中山大学图书馆藏，第2页。

<sup>8</sup> [宋]毛晃：《禹贡指南》卷2，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册，第27页。

<sup>9</sup> [宋]郑樵：《通志》卷40，书华书局，1987年，第549页中。此处的中国并非纯粹的地理概念，更大意义上乃是一

图之类<sup>1</sup>，但是在南宋时出现了争论，说明中原文化在五岭地区的影响。

具体到郴韶两地更加可以看出五岭的华夷有所变化。宋人阮阅对于郴州的描述是“郴山奇变其水清泻”，“三仙一相有遗风，清淑谁言到此穷”。<sup>2</sup>在余靖的《韶州新修州衙记》中提到“按图经（韶）控扼五岭，韶为交衢，虞舜南巡奏乐于此，郡有遗迹，因山得名”，<sup>3</sup>把原来的百粤之地置于正统认同的“三代”脉络下，与中原文化连接。同时在韶州乐昌“自是山录开淑气”，“自是源泉开淑气”。<sup>4</sup>因为两地在宋时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开发，在《粤北区域经济地理的历史变迁》一文中，可以较为清晰的看出唐宋为粤北经济发展繁盛的时期，特别到了宋移民南迁，作为交通要地的韶州，经济文化交流之地，人口速增，商业发展，所以嘉庆《郴州总志》所记载的关于宋代的诗词多为劝农诗，如《桂阳劝农》，且有“日暖鱼增价，风和酒益沽，渔船交过往，商旅及成都”<sup>5</sup>之说。从两地方志的艺术中亦可看出兴学之风开启。在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立郴州宜章、桂阳军临武县学，以教养峒民子弟”<sup>6</sup>。韶州亦然，康熙《韶州府志》论述其府学为至和二年胡牧建，陈邵（宋临江军<sup>7</sup>教授）在《宋进士提名记》中说道：“曲江人物自唐文献公以刚方正直著名，天下之所推重久矣，乐昌为邑则又曲江人物最盛之地也，试举其略，忠义则有谭公……至今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其有进身上庠，蜚声仕路彬彬辈出，抑未易枚举，矧今文教日隆，儒风愈振，魁贤书擢上第者蔚然相辉”<sup>8</sup>。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上述表达者阮阅和余靖，阮在宣和（1119~1125）中知郴州，在《郴江百咏》原序表明作此百篇的目的是“使未尝到湖湘者观之，亦可知郴在荆楚，自是一佳郡也”<sup>9</sup>。而余靖则为韶州曲江县人，李渤、李岩二兄弟为乐昌县进士。作为本地的士大夫或者父母官，他们利用诗文把五岭这一别人认为淑气已穷的地方说成文化佳郡。但是我们看看阮阅对于五岭之一骑田岭其中一座山黄相山的描述：“东带连山接五羊，西分郴水下三湘，路人到此休南去，岭外千峰尽瘴乡”<sup>10</sup>，可知与其他文人士大夫一样认为五岭是清淑之地与瘴蛮之乡的分界。这在宋嘉定年间（1208~1224）袁

个文化概念，用以区分“中国”与“荒蛮”、“化内”与“化外”。

<sup>1</sup>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尚书小疏提要》称“今姑以禹贡经文求之，自五百里甸服至五百里荒服，每面各二千五百里，九州凡五千里，自孔、郑诸儒无有异辞者也。《经》称荆及衡阳惟荆州。《通典》称衡阳郡去洛阳二千七百六十八里。以南北两面计之，已逾于五千里。至称荆州之域兼有零陵、江华、桂阳、连山诸郡，又称零陵去洛阳三千五百五里，江华去洛阳三千五百八十里，桂阳去洛阳三千五百七十里，连山去洛阳三千五百八十九里，则荆州南域已逾千里有奇。恐《经》所云衡山之阳未必辽阔如此。《禹贡锥指》谓骑田岭北为桂阳岭，南为连山，连山亦古南越地，不当入荆域。其驳正最为允协。必反其说，已为非是；乃更谓荆州之域直统交趾，则距洛阳凡七千二百二十五里，较经文荒服里数三倍过之，宁有是事乎？”

<sup>2</sup> [宋]阮阅：《清淑堂》，载《郴江百咏》，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6册，第111页。

<sup>3</sup> [宋]余靖：《武溪集》卷5，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9册，第50页。

<sup>4</sup> [宋]李渤：《昌山》；李岩《玉井云根》，载《全宋诗》第1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476页。

<sup>5</sup> [宋]朱胜非：《泸渡》，载嘉庆《郴州总志》卷37，《艺文·五言律》，第508页。

<sup>6</sup> 《宋史》卷35，《本纪第三五·孝宗三》。

<sup>7</sup> 今江西清江西南。

<sup>8</sup> 同治《乐昌县志》卷11，《艺文》，第175页，[清]徐宝符等修，李榕等纂，《中国方志丛书》第61号。

<sup>9</sup> [宋]阮阅：《郴江百咏·序》，第100页。

<sup>10</sup> [宋]阮阅：《黄相山》，载《郴江百咏》，第114页。

---

燮所写的《重修韶州府学记》中亦有体现“唐人有言中州清淑之气至岭而穷，信斯说也，踰岭而南气皆昏濁，而乖戾邪钟，而为人不若中州人之可贵也。”<sup>1</sup>

可以感觉宋时成为华夷之界向楚粤分界转变的关键时期。同时上述言论已开始强调五岭作为湘楚与交广之间的界线。后来宋祝穆在《方輿胜览》中总结前人对于郴韶的表达，进一步宣传了郴韶两地的战略位置以及其文化状况，更为明确的阐述了五岭在郴韶地区的楚越界线，其言郴州“郡名郴阳，郴江风俗清淑之气蜿蟺扶摇，必有才德生其间，民俗愿朴而劲，风俗脆薄，人才之盛，形胜古桂阳郡，西接九疑，为湘楚上游，在海峽之北，州在百重山之内，实岭麓斗僻之地，南直五岭之冲，钩扶景象，自唐以山水名天下”，言韶州“其郡名始兴，韶阳，曲江，风俗其民短力弱材，习朴而不杂，拳勇善战，为农者不立于耕，为士者鲜力于学，惟简质是安，士之名声抗衡上国，形胜控扼五岭，咽喉交广，唐开北岭，岭道九十里，地高气清，韶郡最大，越之北门”。<sup>2</sup>并且在阐释郴州与韶州的沿革时认为郴州禹贡荆州之域，韶州禹贡扬州之域<sup>3</sup>。虽然《禹贡》中的九州并没有涵盖这一地区，但是正如马端临所说：

唐之中世以迄于宋，沿革多矣，故今所叙州郡，则皆以《宋史》为据，推而上之，以考历代之沿革。至冀之幽、朔，雍之银、夏，南粤之交趾，元未尝入宋职方，而史所不载者，则追考前代之史，以备其阙。而于每州总论之下，复各为一图。先以春秋时诸国之可考者，分入九州，次则及秦、汉、晋、隋、唐、宋所分郡县，考其地理，悉以附禹九州之下。而汉以来，各州刺史、州牧所领之郡，其不合禹九州者，悉改而正之。<sup>4</sup>

古人如此便创造了各州县的历史沿革，后面的地方志在编写时都继承前人说法，本为百粤之地也置于九州范围。

经历宋元的进一步开发，到明代郴州韶州在对方志中已逐步摆脱了中淑之气与瘴蛮之乡的区别。万历郴州志记载道“形胜郴山奇变，其水清泻（韩文）北瞻衡岳之秀，南直五岭之冲（陈纯夫州学记）清淑之气蜿蟺扶輿（韩文），其地为荆楚上游（郴江集序）”<sup>5</sup>。在嘉靖年间的《广东通志》认为“大抵韶近衡岳，气接中州，云韶之人才盛于开元，名公巨乡勋德文章为一时冠当斯祭郴以比虽号多贤，犹或逊之，昔人谓中州清淑之气至郴而止，斯言过矣。”<sup>6</sup>都已开始改变前人的说法，特别是

---

<sup>1</sup> 康熙《韶州府志》卷11，《艺文志》，[清]唐宗尧修，康熙刻本，第1页，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sup>2</sup> [宋]祝穆：《方輿胜览》卷25《郴州·形胜》，第765页，卷35《韶州·形胜》，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1册，第837页。

<sup>3</sup> 《方輿胜览》卷25《郴州·沿革》，第764页，卷35《韶州·沿革》，第836页。

<sup>4</sup>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15，《輿地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2473页。

<sup>5</sup> 万历《郴州志》卷6，《提封志上·形胜》，[明]胡汉纂，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1962年，第266页。

<sup>6</sup> 嘉靖《广东通志》卷27，《韶州》三，嘉靖刻本。



韶州本地人不赞同前人之说，明代的林嗣环在《韶州府学记》中反驳上述宋嘉定年间袁燮所认同的“清淑之气至岭而穷”，“据袁述唐人语何菲薄岭南太甚，岂张余二公而无其人也”<sup>1</sup>，或者认为“南州清淑之气自韶而始，故岭南溪山之胜，韶称最。”<sup>2</sup>但是历史不是这么简单的，正如唐立宗所论述的：粤湘交界一带（处于五岭山区的郴韶地区即为其一部分）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发展是比较迟缓的，当时的湖广郴州：“地当五岭之交，蜿蜒磅礴，连互江广，峰峦陡绝，其关隘独称险阻”。<sup>3</sup>除了官道附近外，多数地方几乎成为化外之地。同样因为山险邑遥，风气阻隔，才会形成如嘉靖《韶州府志》所描述：“山谷之民，至今有老死不见官府这，大抵土旷民稀，流移杂处”<sup>4</sup>的现象。这样的地缘限制，官方难以掌控，而教化又未能及于乡里，使之成为盗区。同时猺峒杂处，明代前期在外界的理解中，这一地区仍属于未开化之地，由于气候等因素在此地瘴疠疾病蔓延，使得朝廷在派遣官员赴任的考量上多有所顾虑，《明太祖实录》载：

琼州府詹州仓副使李德言：“天下有司官例以九年为满，若福建所属汀、漳二府，湖广所属郴州，江西赣州府所属龙南、安远二县，其地亦瘴疠，宜一体量减。”从之，著为令。<sup>5</sup>

那为什么地方志中会改变瘴蛮之说呢？除了作为本地官员对外宣传的因素，还因为明代以降，这一地区虽然发展迟缓，但仍有较大的开发，大量移民迁至此，与当地人们共同发展经济，同时整个岭南地区与中央的关系更加密切，明初地方政府曾经通过编制里甲户籍，将许多原来的“化外之民”收入户籍，使之成为王朝的编户齐民，这一做法后来继续采用，不但变客民为土著，更重要的是将原来政府不能管束的“化外之民”和“无籍之徒，纳入王朝统治的控制之下。”<sup>6</sup>而到了清代，正像陈忠烈在《清代粤北经济区域的形成与特点》（《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中所说粤北地区在清代开始形成“经济区域”，而且有“圣天子武功懋著文教诞，敷绘四海以为池图八荒，而为因此区区一隅，其有不销兵气为日月，变岚瘴为云霞”<sup>7</sup>的说法，郴韶之地在朝中官员中已经完全作为王朝的一部分，即使是“蛮夷”也都得到了教化。在康熙年间，已允许猺峒参与科考，“康熙五十五年奉例科岁各取一名，雍正三年各加二名，每案三名……后许其与土著诸生一体应试……乾隆二十三年改称新民，凡赋役婚丧服食言文俱与民同。”<sup>8</sup>所谓“赖甬冈剿定之后，凿山通道，威宣德怀，

<sup>1</sup> [清]林嗣环：《韶州府学记》，载康熙《韶州府志》卷11，《艺文志》，第3页。

<sup>2</sup> [明]杨万里（四明人）：《凝清堂记》，载康熙《韶州府志》卷10，《艺文志》，第54页。

<sup>3</sup> [明]徐学谟纂修，《湖广总志》，卷30，《兵防·险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地理类第194-196册，明万历十九年刊本，第34页。

<sup>4</sup> 嘉靖《韶州府志》，卷1《风俗》，明嘉靖二十一年刊本，广东中山文献馆藏本，第8-9页。

<sup>5</sup> 《明太祖实录》，卷122，洪武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条。

<sup>6</sup> 参考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第二章《里甲赋役制度与明初社会》，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

<sup>7</sup> 康熙《郴州总志》卷1，《封域》，[清]陈邦器修，范廷谋续修，康熙二十四年刻本影印，第21页中国地方志集成。

<sup>8</sup> 民国《汝城县志》卷3，《猺峒》，陈必闻修，范大淮等纂，第312页，中国地方志集成。

---

而诸蛮始而底定，山藪始获肃清也”<sup>1</sup>。

所以到明代后期整个岭南地区的“瘴疠之气”在逐渐消失，在明代万历年间，叶权《游岭南记》云：

岭南昔号瘴乡，非流人逐客不至。今观其岭，不及吴越间低小者，其下青松表道，豁然宽敞……仕宦乐官其地，商贾愿出其途。余里中人岁一二至，未尝有触瘴气死者，即他官长可知……我朝自平广东以来，殆今承平二百年，海内一家，岭间车马相接，河上舟船相望，人气盛而山毒消，理也。

2

至清代已是“山川疏豁，险阻尽平，两间清淑之气，扶輿磅礴，已与中土并”<sup>3</sup>。参考这里的地方志，发现到明朝时很多文章是关于修学记的，处于五岭交界地的宜章乐昌都建有文昌庙，中举人数也上升到几十人没，明邝埜（宜章邑人，兵部尚书）于《科贡题名记》中道：“宜章自洪武初承明诏兴学毓贤……之后俊秀莫不笃学力行，故由洪武至今，彬彬辈出接踵”<sup>4</sup>，中原文化由渗入到推广，相比唐宋，处于五岭之地的郴州韶州在明清时期，在士大夫心目中已经不再属于中原文化的南界，作为五岭之一的骑田岭在官员以及文人笔下很明确的称为楚粤分界线，“岭前水东流，岭后水西向，地势划然分，楚粤正相望。”<sup>5</sup> 宜章庠生（清）潇芳桂描述折岭为“叠折梯云上，南来第一程，双峰盘楚粤，两界划阴晴。”<sup>6</sup> 所以在对于郴韶的表述上，明显的趋向选择楚粤分界，且在分野中清代不认同前人的一些划分：“韶州府天文牛女分野，星纪之次，按汉书地理志桂阳郡属荆州，为翼轸分野，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以韶州即桂阳之曲江县，故清类分野书断从翼轸，但曲江本粤故地，元鼎六年平粤之后，始内属桂阳，其先则与含涯浚阳同隶南海郡隶交州，班固以为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者是也。”<sup>7</sup>

可见五岭经历了由华夷之界到骑田岭作为楚粤分界的一个历史过程，且由越到粤，其内在涵义的转变：蛮夷的越到广东省或者说广东文化简称的粤，本身在表达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地的士大夫起着重要的作用，外界的看法直到清代才逐渐改观，且楚粤之分并不是楚国与越国之分，更多的是表示两个不同的文化区，而这背后隐含着湖、广两个行政区划的逐步形成确立。

---

<sup>1</sup> 同注 62。

<sup>2</sup> 转引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第 16-17 页。

<sup>3</sup> [清]张渠《粤东闻见录》卷上，转引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第 17 页。

<sup>4</sup>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 14，《郴州文类》，第 1254 页，[明]薛刚纂，吴廷举续修，明嘉靖元年（1522）刻本影印，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

<sup>5</sup> [清]贺峻上：《折岭》，贺为宁乡举人，宜章教谕，载嘉庆《宜章县志》卷 21，《艺文·五古》，[清]陈永图修，嘉庆刻本影印，第 1124 页，稀见地方志汇刊。

<sup>6</sup> 嘉庆《郴州总志》，卷 37，《艺文志下·五言律》，第 54 页。

<sup>7</sup> 同治《韶州府志》，卷 10，《舆地略·分野》，引用《清一统志》所说，[清]额哲克等修，单兴诗纂，清同治十三年刻本影印，第 213 页，中国地方志集成。

## 二、五岭在行政区划中的非界

五岭作为文化意象的符号经历了由华夷到楚粤的变化，翻阅历史文献也会发现古人往往把其作为荆楚交广两个行政区划的边界，如《宋史·地理志》中写道：“荆湖南、北路，盖《禹贡》荆州之域。当张、翼、轸之分。东界鄂渚，西接溪洞，南抵五岭，北连襄汉。”“广南东、西路，盖《禹贡》荆、扬二州之域，当牵牛、婺女之分。南滨大海，西控夷洞，北限五岭。”那么五岭是否真为历史时期的一条行政边界呢？下面从郴韶两地的行政沿革来探讨。主要围绕处在五岭之一骑田岭的宜章和与之交界的乐昌两县来讨论。

在建县以前先看看郴韶的沿革。后人根据《禹贡》的记载，常常认为，郴州属荆州之域，而韶州属扬州之域。战国时，郴韶地区为楚地。秦始皇并天下为四十郡，郴地属于长沙郡，韶州属于南海郡。汉初韶州为南越国占有，郴地属长沙国，作为两个政权的边界并没有以五岭为界，谭其骧先生通过研究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和《驻军图》划出长沙国与南越国之间的边界是“西起秦汉零陵县西南，……越海阳山，都庞岭……循今湘桂省折南折东，又东经连县，抵秦汉阳山关，折东北穿乐昌峡，折东循今湘粤省界，逾大庾岭至横浦关。”<sup>1</sup>而梁国昭先生的《汉初南越国北界及有关问题》（《热带地理》，1995年第12期）通过各种文献记载的数据分析以及西汉进军南越国的路线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南越国的北界并没有到达五岭而是在五岭之南。

西汉元鼎四年（前113年）平南越，设桂阳郡。桂阳郡辖郴、临武、南平、便、耒阳、桂阳、阳山、阴山、曲江、含涯、浚阳等11县。新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称帝，改桂阳郡为南平郡，改郴县为宣风、临武为大武、便县为便屏、曲江为除虜、浚阳为基武，并移郡治于耒阳（改名南平亭）。东汉建武中（一说十一年，即公元35年）还郡治于郴县，恢复郡县原名。郴韶两地同在桂阳郡管制之下，这在《汉书·地理志》中已有明确说明：

桂阳郡，高帝置。莽曰南平。属荆州。户二万八千一百一十九，口十五万六千四百八十八。有金官。县十一：郴，耒山，耒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湘。项羽所立义帝都此。莽曰宣风。临武，秦水东南至浚阳入汇，行七百里。莽曰大武。便，莽曰便屏。南平，耒阳，春山，春水所出，北至鄱入湖，过郡二，行七百八十里。莽曰南平亭。桂阳，汇水南至四会入郁，过郡二，行九百里。阳山，侯国。曲江，莽曰除虜。含涯，浚阳，莽曰基武。阴山。侯国。<sup>2</sup>

五岭在一个郡级行政区下，可见当时统治者没有想把它作为边界，所谓“汉武徙曲江浚阳含涯内属桂阳，守者先固其外取者先多其内筹”<sup>3</sup>。

<sup>1</sup> 谭其骧：《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马王堆汉墓帛书·古地图》，文物出版社，1977年。

<sup>2</sup> 《汉书》卷28上，《地理志》第八上。

<sup>3</sup> 康熙《韶州府志》卷1，《方域志·形势》，第3页。

---

经历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的分裂，二县隶属的郴韶地其历史沿革出现了很多变化。汉末献帝建安二十年吴属争荆州，寻分荆州以湘江为界，东属吴，西属蜀，郴为吴地。吴甘露元年（265年），分南境曲江、桂阳、阳山、含洫、浚阳县置始兴郡，郡属交州，桂阳郡则余6县。晋五帝太康元年（280年）杜预平吴得桂阳仍置为郡，领县六，治郴。怀帝永嘉元年（307年）分桂阳等九郡置湘州。《宋书·地理志》中有记载：

湘州刺史，晋怀帝永嘉元年，分荆州之长沙、衡阳、湘东、邵陵、零陵、营阳、建昌，江州之桂阳八郡立，治临湘。成帝咸和三年（328年）省。安帝义熙八年（412年）复立，十二年又省。宋武帝永初三年（422年）又立，文帝元嘉八年（431年）省；十六年又立，二十九年又省。孝武孝建元年（454年）又立。元嘉十六年，立巴陵郡属湘州，后度郢。领郡十，县六十二，户四万五千八十九，口三十五万七千五百七十二。去京都水三千三百。

广兴公相，吴孙皓甘露元年，分桂阳南部都尉，立为始兴郡。晋武帝平吴，以属广州，成帝度荆州；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又度广州；三十年，复度湘州。明帝泰始六年（470年），立冈溪县，割始兴之封阳、阳山、含洫三县，立宋安郡，属湘州。泰豫元年（472年）复口，省冈溪县，改始兴曰广兴。领县七，户一万一千七百五十六，口七万六千三百二十八。去州水二千三百九十；去京都水五千。曲江侯相，汉旧县，属桂阳。<sup>1</sup>

可以看出有段时间郴韶两地所在行政区分开了，始兴郡从桂阳郡南部析出，郴韶所在地分属到两个不同的郡管理，同时我们看出其在变化中，后来又同属于湘州，不同的政权在取得岭南地区时往往会因为政权需要改动行政区划。所以身处交界地其行政归属是变化的，在划分行政区域时，只是说“分（桂阳郡）南境曲江、桂阳、阳山、含洫、浚阳县置始兴郡”，其南境是否就是五岭以南则没有说明。

在分裂格局中，乐昌宜章作为县级政权逐步建立。前文可知南朝宋时曲江属于始兴郡，泰豫元年改始兴为广兴，齐仍为始兴。梁置东衡州，废始兴，梁天监七年（508年），分曲江县西北境置梁化县，为乐昌县建县之始。<sup>2</sup> 隋开皇九年（589年）废郡，改东衡州为韶州，取州北韶石名，十一年废，入广州，十二年省平石入梁化县，十八年改梁化县为乐昌县，属广州。唐武德四年（621年），平萧铣，置番州，领曲江、始兴、乐昌、临泷、良化五县。贞观元年，改为韶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始兴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韶州。乐昌没有变化。<sup>3</sup>

同时宜章县也开始设置。隋文帝开皇九年平陈废改卢阳郡为县，仍置桂阳郡，治郴县，寻改桂阳

---

<sup>1</sup> [南朝梁] 沈约《宋书》卷37，《志第二十七·州郡三》，中华书局，1974年。

<sup>2</sup> [唐] 魏徵：《隋书》卷31，《地理志下·南海郡》道“乐昌梁置，曰梁化，又分置平石县”，中华书局，1973年。

<sup>3</sup> [后晋] 刘昫：《旧唐书》卷41，《地理志·岭南道》。

---

郡为郴州。大业十三年（617年）丁丑后梁萧铣称帝于荆州，改元鸣凤，据有郴州复称桂阳郡，析郴州南界为义章县。武德四年（621年），平萧铣，置郴州，领郴、卢阳、义章、临武、平阳、晋兴六县。天宝元年（742年），改为桂阳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郴州。义章在武德七年省，八年复置。长寿元年（692年），分义章南界置高平县。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废高平，仍移义章治高平废县。<sup>1</sup> 隋与唐前期两县基本确定。但是没有清楚的表述两邻县或者郴州与韶州的边界。直到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才有清楚的说明，“郴州东南至韶州四百一十里”，“义章县西北至州一百一十五里”，“韶州西北至郴州陆路四百一十里”，“乐昌县东南至州一百四十里”，宋代王存撰的《元丰九域志》载：郴州“南至本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韶（别本作邵）州，三百三十里。宜章在州南八十五里”。而五岭之一骑田岭，亦称黄岑山，《方輿胜览》中记载其在郴县（郴州当时治所所在）南三十六里，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宜章的一部分在五岭以南了，当时的五岭如同汉初时没有成为郴韶也就未成为其上一级政区的行政界线。

五代梁时郴州属楚，唐同，自梁至晋时郴地为马氏所据，天福初（936年）改敦州，改郴县为敦化统县无考。汉乾佑初（948年）复为郴州入南汉。周同。韶州五代时属南汉。

到宋代，郴韶有所改变。宋太祖乾德初攻南汉郴州，克之，置荆湖南北二路安抚司，郴州军，属湖南道，太平兴国元年（976年）避太宗旧名改义章为宜章，景德元年（1004年）以蓝山属桂阳监，绍兴二年（1132年）隶荆湖南路，统郴桂阳宜章永兴资兴桂东六县。韶州改变比较大，宋开宝三年（970年）潘美平韶州，四年俘刘鋹，岭南悉平，改保国为保昌，并始兴县为南雄州，隶广南东路，五年省仁化入乐昌，咸平三年（1000年）复立仁化县，宣和三年（1121）曲江、翁源二县于曲江县浚水铜场置建福县，属韶州，建炎三年（1129）省入翁源县，以韶州领县五，曲江、翁源、乐昌、仁化、建福，乾道三年（1167年）分曲江县西，乐昌县南境立乳源县，其缘由《宋会要辑稿》有说道“昭废置并移广南州县，先是岭表既平，按版籍，州县名多，户口甚少，乃命知广州潘美及岭南转运使王明度其地理废置之。”<sup>2</sup> 大概在结束分裂时政区划分成为必然，不过依然不见五岭在区划上的作用。

元改郴州为郴州路，至元十三年（1276年）立郴州安抚司，十四年置录事司拨在城两厢人户立之，十五年改安抚司为郴州路总管府，隶湖南道宣抚司，统县与宋同。明洪武初（1368年）改置郴州府，统县与宋元同，九年改州裁革附郭郴阳县，添拨平阳蓝山临武三县，改桂阳府为州，仍以三县属桂阳，万历年间统县五。<sup>3</sup>

到元至元十五（1279年）年，改立韶州路总管府，二十三年废浚阳浔光二县，改英德为州隶广

---

<sup>1</sup> 《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江南道》。

<sup>2</sup> 《宋会要辑稿》卷14189，《方域七之一二》，中华书局，1957年，第7430页。

<sup>3</sup> 参见万历《郴州志》卷1，《沿革表》。

---

东元帅府，大德二年（1298年）以翁源隶英州，寻后隶韶州路。至大元年废浚阳二县，以英德为州，延祐六年并翁源入曲江，于是一路所统者曰曲江新民仁化乐昌乳源，亦五县。明朝罢新民官司归曲江县，洪武元年改韶州路为府，改英德州为县，置翁源县，县属韶州府，领县六，曲江乐昌乳源英德翁源仁化。<sup>1</sup>

清沿袭明制，郴韶隶属不变。直至清朝宜章属于郴州，乐昌属于韶州，在方志中其沿革没有很大变化。在韶州内部置县情况有较大变化，但是没有涉及五岭间的乐昌仁化北部，五岭在沿革中并没有成为置新县的重要地带。

由上可知，五岭在疆域中没有成为郴州韶州的界线。虽然到清代亦有云：“九州山川东南最高者，莫踰于五岭，自岭以南隶两广，岭以北隶湖广。”<sup>2</sup>但是万历年间郴州志记载道：“南至广东韶州府界百九十里”，“又州南九十里为宜章县，东西百六十里，南北六十二里”，黄岑山则“在州南五十里”“在县（宜章县）北十里”。<sup>3</sup>虽然这些数据不一定是很精确的，但可看出骑田岭在郴县与宜章县之间，而没有成为郴州与韶州两个不同隶属的郡级行政区的界线。之后的地方志中在描述郴州与韶州的四至八到时可能数据有变动，但是黄岑岭的位置还是在郴县与宜章县之间。

而为何五岭没有成为行政区划的分界线呢？宜章怎么不划在粤属下的韶州？清人陈起书（郴州人，贡生）论述了其缘由：

夫储大文原势所谓郴隶湖南，则粤之险失也，知宜章之水归粤，而不知险之所在。居中乃可制外，今乃欲以外制中，不特郴不可属粤，宜亦不可属粤。宜章所以据岭南上游，此湖南控粤形胜也，使宜属粤，不特上游之形胜失，而湖南之门户亦失，且横绝南北者岭，岭属之粤乎，则楚之水何以为粤之地，属之楚乎，宜又何必属粤，中分之乎，则形势共，必立二关于摺岭之巔，是一国三公也，其他建置皆如此失，而于制猺尤不便。郴五岭之骑田也，骑田南北半猺，摺岭高距其峡，大路横断其巢，而黄毛鉴塘大隈等处，亦同摺岭，立兵以断峡，使其类不得相通，则救援少而逃遁难，近大路村庄复严守之，使不得由平地过，然后节节攻之，一山不过二三百家，易为力矣，若非断龙，则数百里之内，山既相通，种类复一。山闲往来，兵何从知，有日添日多耳，散者散之，攻者攻之，恩威并用矣。吾闻之，疆界之处奸所藏，易避故也，山林之中盗所伏，难稽故也，摺岭东西皆大山，又当疆界之处，不特制猺宜，治盗宜，御外侮亦无不宜。<sup>4</sup>

很清楚的论述了宜章在形势及制猺方面应隶湖南。而且也正因为这里猺峒环处，在历史上常为

---

<sup>1</sup> 参见嘉靖《韶州府志》卷1，《沿革》。

<sup>2</sup> 乾隆《桂阳县志》，卷2《輿地·山川》，[清]凌鱼、黄文理修，李宗纂，嘉庆年间刻本，第30页，中国地方志集成。

<sup>3</sup> 万历《郴州志》卷6，《提封志上·疆域》，第278页，第301页。

<sup>4</sup> [清]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92，《兵政十八·蛮防》。

---

猺乱之地，加之山峦之地，又常有盗贼出没，所谓“壤地相接，山岭相连，其间盗贼不时生发，东迫则西窜，南捕则北奔”，于是对于五岭的治理统治者往往设一军事机构管辖。唐时五岭曾作为一个行政主体，张九龄为五岭按察使，在这一地区还设立了韶连郴三州都团练使，《旧唐书·韦伦传》道：“以中官吕太一于岭南矫诏募兵为乱，乃以伦为韶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韶连郴三州都团练使”<sup>1</sup>。到了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建巡抚于各省，宜章既隶湖广巡抚，又以郴阳界居岭表地，近猺獠，兼听南赣巡抚节制，天启初（1621年），以偏桥沅州两卫，建偏沅巡抚，又受辖焉。”<sup>2</sup>其实整个郴州都在南赣巡抚管辖下，嘉靖五年（1518年）南赣巡抚潘希曾就有说道：“郴桂等处，乃湖南极边与江西、广东接连，隶臣管”。<sup>3</sup>由此交界地往往处于几个政区的管辖，而以往研究这里多注重其“犬牙交错”的划界原则，但是历史并不是那么简单，为了治安或者军事的要求，在划分政区时把交界地置于同一政区管辖下。可见五岭往往没有成为政区的分界线，这在两个政权之间是如此，前文所说的长沙国与南越国其界线就处于五岭以南，在同一政权统治之下，随着行政区划的逐步确定，五岭依然没有成为边界。

### 三、“界”的历史过程

上文中已经阐述了五岭在地理、政区、文化等多方面作为界的处境，文化上五岭经历了从华夷之界到楚粤分界的变化。然而，五岭虽然被古人称为楚粤边界，但实际上并不是行政意义上的分界线。其实文化意义上五岭作为边界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文章第一部分让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处于交界地的郴韶两州在文化归属的选择上，文人士大夫没有含糊，而且往往是以岭为界，这在前文已有描述，原因何在呢？五岭作为长江与珠江的分水岭，在文人士大夫眼中岭之南，水顺流通粤，而岭之北则属楚，其水通向楚，嘉庆《郴州总志》开头的《郴州总图说》中说道“（郴）独西北一角枕衡岳，溯洞庭可顺流而通楚，故为楚属。”但是我们看回宜章县志会发现，宜章虽处于骑田岭之南，也可以说正坐于五岭之间，且其境内发源于黄岑山的章水、玉溪都入广东乐昌，这在郴韶地方志及《大明一统志》和《大清一统志》都有明确的记载：“郴水发源黄岑山”“黄岑山东出桂水寒溪宜章诸水所出”<sup>4</sup>，郴水是湘水的一部分，而章水，在县北三十里出黄岑山，后合流而南少东入广东乐昌县界<sup>5</sup>，为珠江水系的一部分，可在介绍宜章时会说：“宜章新问俗，犹是楚乡程”<sup>6</sup>，可见文化的归属也没有完全按照五岭而定，还有政治划分的因素，从上文第二部分可以看出，宜章是“析郴州

---

<sup>1</sup> 《旧唐书》卷138，《韦伦传》。

<sup>2</sup> 嘉庆《宜章县志》卷2，《沿革考》，第815页。

<sup>3</sup> [明]潘希曾：《竹涧集奏议》卷2，《议处兵备官员疏》，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6册，第26页。

<sup>4</sup> 万历《郴州志》卷7，《提封志·水》，第315页。

<sup>5</sup> 参见《清一统志》卷288，《郴州·山川》，第628页。

<sup>6</sup> [清]聂铎敏：《入宜章界过折岭》，载嘉庆《郴州总志》卷37，《艺文下》，第513页。

南界”而设，一直以来都属于郴州的一部分，政治上的归属影响到士大夫对于此地风俗景观的认同，而他们的表达则给予了宜章清晰的文化归属：“旧志（康熙《宜章县志》）刘带蕙曰：宜章为楚属邑，地居徼外，北枕黄岑而折岭则楚粤孔道，南控西蛮而溪峒则板蛮之所错处也，东则桃花耸秀于天半，西则宝带缥缈于云中，界牌以界兴桂，锁石以锁临蓝，昔人称山为屏障，峒作藩篱，诚确论也。”<sup>1</sup> 实则宜章“北蔽楚南控粤称巖疆焉”，“岭北为郴南为宜，则宜固南楚之屏障，东粤之头颅也”。<sup>2</sup> 很明显的是为楚粤一重要的交界地区，而县志中往往从卷首的《图像》开始便把宜章作为楚的部分来解说，嘉庆宜章县志中对于星野的详细阐述很明显的是论证宜章属于翼轸分野，论述风俗时上溯至《史记》、《汉书》中关于楚的记载，如此便创造了后人建构地域归属的历史传承，宜章置于楚文化圈的历史过程也可窥探一二。文化在这里塑造了空间概念。

这也让我们感觉界在传统时期并不是我们印象中的一条线，而是一个地区，正像黄国信所说，“界在传统时期，在某些制度上本来就不是我们印象中的一条线，而是具有模糊性的一个地区。”<sup>3</sup> 同时我们也知道五岭往往成为古人言中的地区，谓“五岭，炎瘴之地”。如此也更易理解古人为何云岭北隶湖广，岭南隶两广。

进言之，郴韶地区具体的边界在历史时期并没有非常清晰，在古代以赋役和刑名为主要标准来厘定区划的历史背景下，“各地边境交界处，也常因经界不明而形成‘三不管’的管辖死角”<sup>4</sup>，到了明代“江西南安、赣州地方，与福建汀、漳二府，广东南、韶、潮、惠四府及湖广郴州桂阳县，壤地相接，山岭相连，其间盗贼不时生发，东迫则西窜，南捕则北奔。盖因地分各省，事无统属，彼此推调，难为处置。”<sup>5</sup>，康熙年间依然“或因至不清而临壤搆争，竟同聚诉者有矣。”<sup>6</sup>。虽然各县志都会详细记载四至八到，但是正如民国陈必闻在修汝城县志所说“按古时分地置县，必顺其地势为之疆域，故历来方志于县境正隅界至远近，里距纪之务审，盖将以辨封畛社侵越也，旧志于四至八到详于近界之邻境，而略于界所在地，如所载东至崇义县界文英者若干里，云云，并不唯指其划分之点，未免语涉牵混，其所记里距亦多失实。”<sup>7</sup>

加之此地为瑶峒错杂之处，前文看到在乾隆年间这些瑶民峒民才改为新民，编入国家赋役体系，之前没有成为“编户齐民”，他们所处的地方又往往临近边界，如汝城县（旧桂阳县）的城溪峒，在县南七十里，临广东仁化县界，延寿峒，在县西南六十里，临近广东乐昌县界，姜阳峒，在县西南

<sup>1</sup> 乾隆《宜章县志》卷1，《图像·图说》，[清]杨文植、姜顺修，杨河纂，乾隆二十一年刻本，湖南图书馆藏。

<sup>2</sup> 嘉庆《宜章县志》卷4，《疆域志上》，第828页。

<sup>3</sup> 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临地区食盐专卖研究》，第245页。

<sup>4</sup> 唐立宗：在《“盗区”与“政区”之间——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演化》，绪论1。

<sup>5</sup> [明]王守仁：《王阳明集》卷10，《别录二·奏疏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sup>6</sup> 康熙《郴州总志》卷1，《封域》，第31页。

<sup>7</sup> 民国《汝城县志》卷3，《疆域》，陈必闻修，范大淮纂，中国地方志丛刊，第95页。



---

八十里，临广东乐昌县九峰界，往往因相邻而使得界线不清，如九峰峒系广东乐昌县所辖，旧志（桂阳县志）以其地相邻牵连，编入坑峒。<sup>1</sup> 那么没有管辖到这些峒时，边界之说更加不可信其为当时真正的界线。

直到民国时期，县志中对于边界的划分才清晰明确，民国《宜章县志》对于幅员的描述为“东南之乐昌界二十里（汪家充分，旧志作湾，误，通志作三十里亦误，此就近界言），东南界乐昌现在六区境内者以——三界墟——莲花井——桥子头——牛头窝——……上富村——栗岭——正崎岭——等处为界”，“西南界连县及阳山乳源三县，其在四区境内者以——天鹅塘——崖子岩——……狗牙洞等处与乳源县为界”。<sup>2</sup> 并且民国时期对于宜章村庄的统计“达一千五百有奇多”，而“旧志村庄五乡分编，连阳乡，村庄七十八，永平乡六十八，永福乡二十三，太平乡五十四，长宁乡九十六，共三百十一九”，“逾五倍以此知旧志漏掠夺矣”。<sup>3</sup> 虽然这当中不一定都是因为漏略，可能是领土的扩大，亦或重新划分使得村庄增加，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交界地在县级以下的行政区划在历史时期并没有清楚的界定，在县志中记载详细的为“都”，因为明初里甲编制必须“务不出本都”，也就是按都为单位编排里甲。“都”一级区划的意义亦由此得以体现。

根据刘志伟的研究，明初推行黄册里甲制度的重点，在于编排里甲，保证征税和差役的供应，而对其他层次的社会基层组织的设置，明王朝并无划一的规定；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作为户籍编制的里甲制度，是国家行政系统中最基层的一环，而宋元以来一直存在的乡都之类的地域性单位，似乎并不在这一行政系统之内，至少在制度上没有赋予其多数实际的行政职能。由此州县以下，实际存在两种基层组织的层级系列，一种是“县——都——图”，另一种是“县——乡（都）——村”。前者是在明代里甲体制基础上形成的户籍管理系统，在这一系统中的都图里甲属于户籍编制的单位，后者是基层社会既有的社区组织系统，在这一系统中的乡社村落是以自然聚落为基础的地域单位。<sup>4</sup> 不过不管都的性质如何，村落往往在县志中被忽略。这种情况直到清代依然如此，如同治《乐昌县志》中，在记载乡都聚落时，郭东都和安口都下面都没有列村落，而其他的几个都也是详略不一。<sup>5</sup>

直到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试图通过划分学区、警区和选举区，来重构以往的县级以下区划，其后形成了以乡镇为单位的行政体制，所以我们才看到民国时期对于边界划分的详细程度。

## 结 语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初步探讨，会发现五岭交界地的处境颇为复杂，在行政区划上，他们会有

---

<sup>1</sup> 民国《汝城县志》卷3，《峒峒》，第133-134页。

<sup>2</sup> 民国《宜章县志》卷3，《疆域志·幅员》，邓典谟纂修，民国三十年活字印本。

<sup>3</sup> 民国《宜章县志》卷3，《疆域志·村庄》。

<sup>4</sup>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第46-50页。

<sup>5</sup> 参见同治《乐昌县志》卷1，《聚落》。

---

交错，各种政权势力侵入这一带时便有了不同的行政区，对于郴韶来说他们从春秋战国时期起便经历了由同一政区管理到不同政区管理的多次变化，五岭的战略位置使得郴韶两州成为必争之地，为了更好的控制这一带，这里的行政区划不仅利用山川形变，且不忘犬牙交错，周振鹤先生认为这两个原则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越到后来，犬牙交错的原则越占上风，这一点反应了中央对地方控制愈来愈紧，中央集权愈来愈强的客观事实。他特别强调了五岭地区的犬牙交错。<sup>1</sup>同样因为这里的特殊位置，为了治安或军事的需要，又“违反”两省政区划分的“犬牙交错”，把这一地区置于同一政区管辖下，在郴韶两地的建置沿革中很好的体现了这一过程，同时在以赋役和治安为标准的政区划分中，往往会因不同时期田额的增减影响里数的增减，五岭作为猿峒杂错的山区交界地，经常因为战乱而成为政区之间的间隙地，行政界线在此并不明晰。在文化的认同中五岭开始是“华夷之界”，到后来主要成为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楚粤分界，再到今天人们认为的湘楚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分界线，这一历史过程的展现，也就建构了“界”的历史。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虽然郴韶两地的文化归属很清楚，但是在楚粤分界中五岭亦不完全是界，因为岭之南的宜章依然属楚。这可能涉及到一个更大的论题——区域与界的关系，两个区域的“边界”本身，就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区域，进言之，传统上所谓区域的界线应该是一个区域而不是“界”。历史上的五岭交界地，文人士大夫是想方设法使之与中原文化挂钩，而今天这里的人们则不断地向港澳粤靠拢，“郴州为港澳粤后花园”的说法动因何在？颇值玩味。

在探讨中，虽然对于五岭作为文化界线的历史过程有了比较清楚地表达，但是所引的材料都是外人或者郴韶两地的官员和士绅的言论，而这里的平民百姓是如何选择自己在行政和文化上的归属，并没有得到解决，有待深入研究。且本文选择的只是一个特殊的地区：郴韶两地，而探讨的五岭也只是其中之一：骑田岭，其他岭都有其本身特点，在界的形成过程中有着自身的发展路径，如何使得研究更具普遍性，则是本文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点。

[原载吴滔、于薇、谢湜主编《南岭历史地理研究（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7页。本文经编者授权发布。]

---

<sup>1</sup> 参见周振鹤：《地方行政制度志》第七章，犬牙相入还是山川形便？——行政区域划界的原则。